

ZHONG RI
JINDAIHUA
BIJIAOYANJIU

〔日〕
• 依田 熹家 著
• 孙志民 编译
• 翟 新
上海三联书店

中日 近代化 比较研究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

(日) 依田熹家著

孙志民、翟新 编译

孙志民 校订

43

上海三联书店

1160070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

张志君、翟新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 125,000

印数：1—3,500

ISBN 7-5426-0022-2/K·4

定价：1.70元

编译者的话

1985年春，依田憇家教授应邀到复旦大学举行“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专题讲座。讲学内容是他长期研究中日近代史的结晶，在中国尚属首次发表。事后参加讲习班的师生对依田教授的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依田教授有关统一市场、中国的科举制、华夷思想及中日两国振兴实业政策等问题的论述是颇有见地的，其比较研究的方法亦是可取的。然而由于讲习班授课时间有限，双方均有言犹未尽之憾，当时约定，由我负责将全部讲稿译出分送各位听讲者。

本书作者依田憇家现任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早年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史学专业和同大学商学部研究院经济史专业，后历任早稻田大学副教授、教授；津田塾大学、立教大学讲师。专攻日本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经济史亦有较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和革命形势》（八木书店出版）；《战前的日本和中国》（三省堂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占领地区的统治》（河出书房出版）等；并译有严中平的《中国近代棉纺织史稿》（校仓书房出版）；牟安世的《太平天国》（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宓汝成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铁路》（龙溪书舍出版）等。依田教授曾来我国访问考察数次，和我国学术界同行有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近年来又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

学等高等学府讲学任教，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其学术成就亦开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本书的特点可概括为如下诸点。第一、作者运用了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比较研究方法，并以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至二十世纪初为论述对象，既从研究角度上给人以新鲜之感，同时又与赖肖尔等人所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近代化”论划清了界线。第二、为搞清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中日近代化起点的问题，作者系统地具体比较了中日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以及中日两国振兴实业政策的全过程。所搜集的材料之多，之广，在我国实属鲜见。第三、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在有关欧美的知识方面，十九世纪中叶前，除科学技术外，日本尚有许多不如中国的地方，日本对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的认识不少是通过上海、香港发行的洋务书籍得来的。但日本能把尚不完整知识迅速用于国内制度的改革，而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动向。中国对欧美的热情仅限于引进武器、机械及其相关方面。在振兴实业方面，中日两国在相同的时间推行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官督商办”政策，其性质属于“官僚监护制度”，是一条发展近代工业的死路。日本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通过出售官营工厂，实行了官民资本的分离，产生了近代产业。而中国则继续徘徊在死胡同里，分歧由此而起。第四、作者认为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差距的原因，不仅要考虑该国资本主义各种萌芽的发展程度，而且还要考虑这些萌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经济性的结合，因而关键是看有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作者指出，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一贯具有分裂的倾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北伐革命才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变法

派都没有像日本讨幕派那样提出打倒幕府，以强藩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目标；中国出现了买办资本和地方军阀，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充其量只是形成了几个巨大的地方市场。以此为基础的清王朝是一种“变形领主制”，它完全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所建立的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国家。中国所以较晚才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作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情况下，国土狭小，四周是海的日本比起国土广大，且系内陆国家的中国更易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由于没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所以缺乏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前提，此乃中日两国在诸方面形成差距的根本原因。第五、除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个根本原因外，作者认为统治机构的科举制和世袭制，对外意识中的华夷思想和攘夷思想等差异亦是中日两国在向近代国家过渡时形成差距的原因。作者指出，中国科举制的合理性使整个统治阶级都眷恋于它，而日本世袭制的非合理性则使统治阶级中的下级武士亦对它深恶痛绝。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满足于维持现状，另一个则热衷于改变现状的差异。第六、作者指出，中国的变法派一方面已认识到“君主开明专制最恶，民权公议最善”，另一面却又拥护强权君主制。所以会有这种混乱，作者认为原因就在于：中国需在列强干涉和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同时解决实现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国家和近代国家本身这两个属于不同阶段的课题。日本则因列强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并具有已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样一些有利条件，故得以成为亚洲唯一能够有步骤地逐个解决上述两个属于不同阶段的课题的国家。第七、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明治维新并没有马上导致近代国家的建立，其意义在于它建立了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国家（绝对主义）；制

定宪法、开设国会是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果；革命形势高涨和政治、经济改革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明治十四年(1881年)是日本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者进而指出，中国变法派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未能充分理解自由民权运动的意义，以为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开始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这甚至“在以后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人的近代日本观原型”。

本书根据依田教授的讲稿译出，后又参阅依田教授回国后陆续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有关论文。脚注除标明“编译者注”外，其余系原作者所注。书中引文除个别短句无从查核外，其他均参照中文原文译出。

欧美、东欧、苏联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对中日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本书的出版，一定有助于我国这方面的研究。

本书第一、三章和第四章第三至五节由翟新译出。全书由孙志民校订、统稿。

本书的编译工作是在吾师吴杰教授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学友吴根樑亦在查找引文出典和赐教有关历史背景方面给予了不可多得的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本人学识浅陋，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乞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志民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上海

目 录

编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关于亚洲近代化的几点看法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	1
第二节 亚洲近代变革的形态	4
第三节 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	10
第四节 战前天皇制的性质	16
第二章 关于十九世纪下半期中日两国的近代化	
第一节 关于统一国内市场问题	19
第二节 统治体制和人民斗争	22
第三节 关于两国的思想情况	31
第四节 两国近代化的经济过程	44
第三章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第一节 中日两国对西欧国家制度的介绍	54
第二节 幕末所目睹的欧美制度	59
第三节 欧美制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62
第四节 以统一国家为目标的制度改革论	67
第五节 明治维新政权的成立	80

第四章 十九世纪末中日两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第一节	作为出发点的《政体书》·····	86
第二节	废藩置县后绝对主义体制的动摇和对近代国家认识的发展·····	91
第三节	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	100
第四节	向近代国家过渡·····	110
第五节	中国对近代国家的认识·····	121

第五章 关于十九世纪下半期中日两国的振兴实业政策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下半期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139
第二节	中日两国政权的比较·····	140
第三节	中日两国振兴实业的过程·····	144
第四节	关于中日两国的买办·····	158
第五节	日本殖产兴业政策的探讨·····	164

附表

主要官业处理实施过程·····	171
-----------------	-----

第一章

关于亚洲近代化的几点看法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如何理解日本近代史上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国家的性质，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发轫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对历史学、也对以后日本的社会科学所有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自此以后的研究尽管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有所深入，但对提出的根本问题，依然尚未得出结论。

在三十年代的论争中，参加《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的人们(讲座派)主张，明治维新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绝对主义的成立^①，明治二十二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则标志着绝对主义的确立。他们的立场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上，即当时日本面临的社会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应该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参加《劳农》杂志的人们(劳农派)则认为，明治

① 依田教授认为，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绝对主义国家的本质是封建性的，但它是创立近代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前提。日本明治维新及其初期的改革建立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日本真正的近代国家是在自由民权运动后诞生的。日本当时的情况可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三月革命”的论述来加以说明，德国三月革命失败后，由于革命的压力，普鲁士专制君主制从具有封建性质的绝对主义国家转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波拿巴主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编译者注

维新的性质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样，虽然论争本身是围绕当时“面临的革命的性质”提出的，但在如何理解近代日本的社会性质这方面，也包括未必将革命作为问题的人们，于是论争就被作为社会科学的整体问题提了出来，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围绕日本近代国家的性质产生上述论争的原因，在于日本虽然具有达到垄断资本阶段的发达的工业，但却在政治形态、土地关系等方面遗留着和欧美各国迥然不同的可视为“前近代的”形态。尤其是战前日本的农地有60%被置于地主、佃耕制之下。在地主、佃耕制下，农产品的50~60%在多数场合是以实物形式被剥夺的，此外，几乎不承认近代农业制度所特有的租地者的权利。讲座派把地主租佃制规定为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的，劳农派则将其规定为“变形的资本主义”。

出现以上关于战前日本国家性质的不同见解，其原因除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还可指出，即日本近代国家和欧洲近代国家在成立时就有许多不同处。在最早形成近代国家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是通过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力量进行的，并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在日本，明治维新虽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但却采取了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极为不同的形式。无论是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还是在其后执掌政权的人中，很难找到如西欧那样的“市民阶级”。

从上述理由可知，历时许久的论争是围绕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及其性质而展开的，我对这些问题作如下考虑：

(1) 亚洲的近代化也是作为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起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环节展开的，它以通过开港而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为契机。

(2) 亚洲近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土地革命。在当时东亚地

区的基本倾向，是通过土地革命实行近代化(如，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朝鲜的东学农民战争)。

(3) 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其前期是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主要形式推进的。它和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具有前近代的性质。可是，在日本，主要因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和政府方面对实试中的失误进行了反省，故而使政府在后期殖产兴业中实行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然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4) 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的成立，与此同时，自幕府末期至自由民权时期始终存在的革命形势，虽然没有促成革命胜利，但通过波拿巴主义的形式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应该予明治十四年政局变动以足够的重视，此外，根据明治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其本质不是绝对主义的确立，而是波拿巴主义的成立。

(5) 通过明治宪法体制的成立，日本大体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民主主义革命的课题尚未完成。另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背景，虽在大正时期出现了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过渡的动向，但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潮流中最终却演变为法西斯体制。因此，民主主义革命的课题在战前日本是始终存在的。

我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起点，但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解决近代国家的形成问题，要考察日本近代国家的成立问题，应该把自由民权时期也包括在内。

在把战前日本革命的性质认作是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点上，可以说我是继承了原讲座派提出的关于革命的课题。但在以下几方面和上述二种主张持有不同见解。

(1) 原劳农派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把战前日本面临的革命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回避了当时对天皇制的斗争和劳农同盟问题。另外，把战前的地主佃耕制也规定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实难自圆其说。

(2) 讲座派的主张不能说明明治时期及其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讲座派系统的见解不尽一致，有认为通过制定明治宪法确立的绝对主义体制一直持续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也有认为绝对主义体制在某个特定时期已经变化。前者把日本近代社会看成凝固和毫无变化的，而后者则未能对何时以至怎样变化等问题解释清楚，结果日本绝对主义国家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我之所以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立恰在明治十四年政局变动至制定明治宪法这一期间，是因为这时期同时出现了A、革命形势的高涨；B、政治上的变革（颁布宪法、开设国会）；C、经济上的变革（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扶持民间企业）这三方面的重要事实。如此集中地出现那么多的改革，这在战前无论那个时期都是没有的。

第二节 亚洲近代变革的形态

——以太平天国革命和明治维新为中心

在考察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等一系列亚洲的近代化运动时，有必要首先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运动采取了怎样的形态。

在日本长时间内有一种倾向，即在考察近代变革问题时，往往把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西欧的变革视为“典型”，并以此为衡量尺度。这是因为，西欧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最先成为资

本主义“强国”，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学习、赶超这些国家。上述倾向不仅在统治者方面，而且在有志变革的人士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在历史学领域，这种倾向也十分强烈地表现着，即先是把西欧国家的历史过程视作“典型”，然后以此过程中揭示出现象为尺度去衡量他国（也包括日本）的历史。这种方法在战后曾几度予以反省，但由于找不到适当的尺度，所以可以说在总体上仍在盲目地使用。我认为，上述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二种观点所以能够并行存续至今，这也是原因之一。

把西欧的近代化过程作为典型，并将此套用于对其他地区历史的考察，这主要是依据这样一种看法，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究其实质是市民革命。诚然，在战前和战后的西洋史研究中提出这一问题的著作也曾强调过农民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不能否认资产阶级革命，即市民革命的意识，是牢固地为研究者所接受的。然而，这和早就出现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崛起的西欧不同，在东亚，市民阶层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势力，其近代变革也理所当然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态。关于如何说明上述历史过程，虽进行过一系列尝试，但还不能说已很充分。

就此，我认为要论述近代化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仅以西欧为例是不够的，必须兼及以后其他地区的情况一并予以考察。

关于这一点，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列宁有关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论文。列宁在这些论文中规定：“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并就当时的俄国革命指出，“这次转变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

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关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报告》）。

上述论文提出许多问题。也就是说，即便从“社会内容”看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定要采取市民革命的形式。如一九〇五年时的俄国，在无产阶级已经发展、组织到相当程度的情形下，即便从“社会内容”看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有时也可以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尽管这样，它既然“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就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如上所述，假设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有多种形式，那么东亚的形式又怎样呢？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例，认为它们属于“土地革命的形态”或“把土地革命作为潜流的形态”。并还可以包括时代稍后的朝鲜甲午战争（所谓东学农民战争）。

首先，应该注意到上述运动都是在本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发生的，这一点正表现出和这些国家以往的农民起义所不同的性质。下面还要进而就此探讨。

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为基本纲领。由于长年处于作战状态，这一纲领并没有得到充分实行，即便如此，纲领本身仍有很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太平天国后来提出了见之于《资政新篇》的具体政策。《资政新篇》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然其主要点是形成基于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的全国交通网，奖励开发产业和设立金融、邮政、新闻机构。可以说它所揭示的便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太平天国革命虽是失败的革命，但它在表明亚

洲的近代变革形式即土地革命这一点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其次，若要对明治维新进行考察，就应该对在维新时期人民斗争的深层出现的土地革命要求予以关注。我认为，以往学术界作为问题提出的维新时期“改变世道”的情况，从本质上讲也属于土地革命。也就是说，指出维新阶段的人民斗争是由“惣百姓起义”^①向以“改变世道”为中心的阶段发展的。这作为对现象的揭示是正确的，但它们的本质仍属于土地革命的动向。日本维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否定领主土地所有（要求否定贡租、或通过大幅度降低租额来作事实上的否定），另是要求否定地主土地所有（要求归还抵押地、流失地），但两者都以“把土地交由耕作农民”为基本点。

在幕末日本，农民斗争和城市贫民起义迅速高涨，这类斗争尤其集中在幕府崩溃前后，成为全国性的起义。幕末时期的人民斗争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不同，日本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全国统一的司令部、纲领和独立的军队。这是因为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组织是分层统治机构。因此，应该把当时各地起义农民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予以集中化，进而探究农民斗争作为整体具有怎样的要求。我认为，在幕末农民斗争的深层，也具有土地革命要求，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种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图景。土地革命要求，可表现为这样几种形态：要求土地的再分配，否定领主的贡租和地主的佃租，基于要求大幅降低租额而对贡租和佃租作事实上的否定。其它要求还包括，农作物的自由栽培，农产品的自由买卖，经营

① 德川幕府中、后期，由村吏领导，广大农民积极参加的反抗领主的斗争。

——编译者注

自由，废除庄屋组织^①等封建的统治机构和村落机构。爆发于幕府崩溃时期的大规模农民斗争——“会津改变世道”，即可评价为是在总体上大略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斗争。

明治维新时期参加赤报队，后来又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信浓国佐久郡八幡村的农民依田铁之助，在明治初年曾以土地的国有和均分为核心内容起草过土地改革的建议书。这件事告诉我们，幕末维新时期农民斗争的动力，就是土地革命。

可以认为，日本以近代化为目标的斗争，其基本形态，是以土地革命为潜流的。列宁在《农业纲领》中把土地革命称作“最彻底的资产阶级发展的要求”，我认为，在十九世纪的亚洲，土地革命是近代变革的基本形态。

把上述论点稍予整理，可以看到近代变革具有三种基本形态。

(1) 像西欧那样的以市民势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市民革命形态。

(2) 像一九〇五年时的俄国那样的以无产阶级的相当程度的组织成长为前提的“无产阶级革命”形态。

(3) 像十九世纪后半期亚洲出现的那种土地革命形态。

前面说过，近代变革的亚洲形式就是土地革命形态，故而，农民斗争的能量势必成为变革的动力。这就难免产生疑问，这类农民斗争“和封建社会内的一般农民斗争在哪些地方存在着差别”。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明白“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矛盾之中”，即是说，必须区别作为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对立要素和作为导致新旧社会更替要素这二类农民斗争。由前者向后者过渡，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其契机便

^① 江户时代的村吏之长，即是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又是村落共同体的首领，多由地方上有名望的富裕农民担任。——编译者注